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 唐代妇女 生活与诗



徐有富◎著

中华书局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 唐代妇女生活与诗

徐有富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妇女生活与诗/徐有富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ISBN 7-101-04751-3

I. 唐… II. 徐… III. ①唐诗-妇女文学-文学  
研究②妇女-生活-中国-唐代 IV. ①I207.22②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0196号

- 
- 书 名 唐代妇女生活与诗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著 者 徐有富  
责任编辑 张文强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mailto: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9月北京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2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751-3/1·634  
定 价 28.00元
-

## 总 序

莫砺锋

南京大学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仅有一年，但是说到本中心的学术传统，却必须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斗转星移，如果把1914年9月由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设立的国文预科班和国文专修科视为南大中文系的直接源头，那么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九十一个春秋了。去年在庆祝九十周年系庆时，我为了回顾系史而整理了一份曾在我系任教的已故著名学者的名单，发现他们中间曾经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竟占三分之二以上，例如：王伯沆、李审言、黄季刚、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吴瞿安、陈去病、顾实、汪东、姚永朴、陈匪石、卢冀野、胡翔东、闻一多、陈登恪、刘国钧、王易、罗根泽、朱东润、钱南扬、吴白匋、管雄、王气中、程千帆等。这些学者在南大任教的岁月或长或短，研究领域则各有专攻，但若论学风之朴实、学术之精湛，他们堪称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我系的古代文学研究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久享盛名，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曾以“东南学术”之名驰誉海内外，到八十年代以后又成为全国著名的重点学科。当然，像国内所有大学的中文系一样，南大中文系始终伴随着整个国

家的风雨历程,先后经历了抗战西迁、院系调整以及文革等曲折过程,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重返正常的发展轨道。由于我系的前身之一是民国时代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又位于民国的首都南京,所以我们比国内其他著名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更多的艰难历程。抗战时期南京沦陷且遭到严重破坏,我系仓皇西迁,本来可以大展鸿图的发展前景化为泡影。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我系又受到有意无意的压抑和削弱,在国内的地位逐渐下降。此外,我系曾是以“学衡派”为标志的东南学术的重镇,由于学术思想领域内激进的左翼倾向渐占上风,而东南学风则被主流意识形态打上了“保守、落后”的烙印,我系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话语权日渐衰微。在上述过程中,古代文学学科所受到的打击是中文系所有学科中最为深重的。尤其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厚今薄古”的整体性学术氛围、“古为今用”的指导性研究思路,都使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动辄得咎。及至后来,在“大破四旧”、“儒法斗争”等喧嚣声中,整个古代文学学科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等到阴霾散尽、大地春回的时候,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雄风不再,而且甚为衰微了。正在此时,年过六旬的程千帆先生应聘到南大来任教,为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注入了生机。程先生曾在南大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求学,师从黄季刚、胡小石、刘国钧、胡翔冬、吴瞿安、汪辟疆等名师,还向当时在南大的另一个前身中央大学任教的汪东、王易等先生请益,不但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老师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正由于程先生的学术基础是在南大打下的,由他返回母校来领导重振古代文学学科的工作,在学术渊源上就与南大的传统天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程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总结出一套特色鲜明的学术理念,由他来主持南大古代文

学的学科建设,就有条件形成较为鲜明的学科特色。于是,在程先生的主持下,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逐步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发展壮大,终于成为以成就卓著、特色鲜明而为学界瞩目的全国重点学科。

那么,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究竟有什么特色呢?简单地讲,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文学与史学沟通。先说第一点:程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呼吁运用“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来他又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这个理念,如“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两个层次相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等等。说法虽异,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考证与批评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两翼,古今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长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有的甚至互相轻视。在学术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可说是当代第一人。幸运的是,与程先生一起领导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对上述理念心领神会,程先生的观念成为整个学科的共同理念。三位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视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并亲自动手做文献整理方面的工作,程先生撰写了四巨册的文献学教材《校雠广义》,还在古稀之年主持编纂《全宋词》。周先生费几年之功完成《唐语林校证》,还专门撰写了长达五万字的《唐诗文献综述》。卞先生长期从事清代、民国碑版的收集、整理,还编定郑板桥的全集。此外,三位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中也十分重视文献学的训练,自从1979年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校雠学课程以来,这门课程二十多年从未间断,业已成为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最重要的传统课程之一,一届又一届的同学们从这门课程中得到了文献学方面的严格训练。

其次,南大古代文学学科非常重视文学与史学的沟通,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不自设藩篱。古代中国的学术本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因为古代的学术文化本是一个整体,对它的研究也不宜只见一个侧面。程先生平生治学,虽然重点在文学,但也很重视史学,他在《史通》研究上花了那样多的心血,就是一个明证。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的研究工作也是文史兼通的。七卷本的《周勋初文集》中即收入了《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两种著作,仅从书名就可知其性质是打通文史的。在卞先生的著作中,关于唐代诗人的年谱和评传显然都得力于其兼通文史的学术功底。更重要的是,三位先生即使在研究古代文学领域内的具体课题时也经常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例如程先生在研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关系时,就得益于对唐代科举制度等历史知识的熟练掌握,从而在资料的收集、甄别以及史实的考订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并得出了不同于前贤的新说。程先生的此项研究被认为是文史结合的典范性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又如周先生对曹魏集团“三世立贱”的现象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文史兼通,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精彩的论文来的。再如下先生关于唐代传奇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的一系列论著,别具手眼地将唐传奇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进行解析,从而使一些长期聚讼纷纭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凡此种种,都说明三位先生的学术研究均具有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来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性质。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也都接受了这种学术路数,而且已有不俗的表现。

岁月不居,一个学科迟早会面临新老交接的问题。薪积火传,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在于代代相传的学术精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老一辈学术带头人逐渐退出学科的日常工作,年轻的一代逐渐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由于学科的新一代成员大多是程先生他们的入室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以上述学术理念在学科内部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扬,尽管各人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路数并不相同,但是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实证性研究的课题倾向却是基本一致的。十几年来,学科成员发表的论著在数量上也许不算太多,水平也许不算太高,但是基本上都做到了言之有物、立论有据,基本上避免了游谈无根或空洞无物的弊病。在当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甚嚣尘上的大环境中,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而心无旁骛。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学术必须创新,尤其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手段的更新等方面,我们决不能因守师法而固步自封。近年来在学科内部已经孕育出域外汉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新的学术生长点,初步体现出开拓性的新气象。但是就原则性的学术精神而言,我们仍然坚守着本学科相沿已久的传统,我们坚信这是有利于本学科健康发展的优秀传统。

2004年1月,我们成立了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心的成员都是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成员,中心的物质条件也就是古代文学学科的原有图书、设备,此外一无所有。由于没有固定的办公用房,我们甚至没有悬挂中心的牌子。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呢?我们又为什么要以“中国诗学”作为中心的名称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想合在一起回答。从表面上看,南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是在学校的要求下成立的,是为了适应现今的学术管理体制,也是为了进一步集中学科力量、凝炼学科方向的必要举措。从本质上看,诗学中心的成立确实能发扬本学科的传统,凸显本学科的特色,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本学科的优势。众所周知,程千



帆先生的治学范围相当广泛,举凡校雠学、史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堪称核心的领域,那就是诗学。程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如《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被开拓的诗世界》等都是关于诗学的,此外他还编选了《古诗今选》、《宋诗精选》、《日本汉诗选评》等诗歌选本,这些诗选的选目和注释评析也都体现了程先生的诗学观点。同样,在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唐诗研究也是特别耀眼的一个闪光点。可以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活动中,诗学一向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我们所说的“诗学”,并不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泛指文艺理论的 Poetics,也不是专指做诗、论诗的学问,就像唐人郑谷所说的“衰迟自喜添诗学”或朱自清所说的“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鉴赏而言”。在我们的理解中,“诗”是广义的诗,即包括辞赋、词曲等文体在内的所有韵文;“诗学”也是广义的诗学,即一切有关“诗”的研究,包括对历代诗歌总集或别集的整理、编纂(例如重编《全唐五代诗》以及编纂《全清词》)、诗人研究(例如诗人年谱、评传)、诗歌研究、诗歌史研究、诗歌流派研究、诗歌理论研究等方面。近年来,我们还有计划地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域外汉文诗话的整理、古代诗歌的文化学研究等。我们当然并不认为“诗”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内容,也不认为“中国诗学”这个名称可以涵盖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全部学术活动,但是我们确信本学科投入力量最多、创获最大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诗学”。所以,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虽然是新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但是其组成情况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基本重合,其学术渊源、学术路数以及学风倾向也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完全一致。

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内部,我们一向尊重每个成员自己的研

究兴趣,很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课题。因为我们相信,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必然是高度体现个性的,同样,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个性化的一家之言。除了大型的古籍整理之外,我们从不奢望编写出大部头的集体著作,而情愿向学界奉献单篇的专题论文或篇幅不大的个人专著。诗学中心成立后,我们依然希望保持这种特色。诗学中心成立一年以来,中心成员完成了六部专著,它们是:莫砺锋的《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徐有富的《唐代妇女生活与诗》、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综论》、许结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程章灿的《赋学论丛》、赵益的《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现在我们把它们编为一辑,交中华书局出版。读者很容易发现,这六本书从内容到写法都并不完全一致,以至于我们很难按时下惯例,为它们起一个“某某丛书”的名称,所以名为《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这六本书算是专刊的第一辑。一年前,诗学中心是静悄悄地成立的,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发布消息。现在我们对诗学中心专刊的出版也不会作任何宣传,只希望把它们静悄悄地呈送到读者面前。作为诗学中心的主任,我有责任向读者介绍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此辑专刊的由来,是为序。

2005年2月20日

## 引 言

《全唐诗》近五万首诗中,涉及妇女的占五分之一左右,其中以描写妇女为主的诗大约有六千七百首。显然,这是一笔十分丰富的诗歌遗产。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sup>①</sup>将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结合起来研究,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周秦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封建社会,但成千上万的妇女却依然处于奴隶地位。曹操在历史上算得上一个英雄人物了,但在他眼里妇女不过是玩物。曹操在公元210年筑了一个铜雀台,把许多宫女关在里面供他玩乐,死后还要他的妾与伎人对着他的坟墓歌舞<sup>②</sup>。这实际上是把他的妾与伎人当作活的殉葬品。唐代守陵的宫廷妇女也很多,不幸的铜雀伎引起了唐代诗人普遍而深切的同情,据《全唐诗》所载,有三十多位诗人写诗吟咏了这件事。试举两首小诗为例。一首是罗隐的《铜雀台》(656/7545)<sup>③</sup>:

---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571页。

② 详见《全三国文》卷三魏武帝《遗令》,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1068页;《乐府诗集》卷三一,中华书局,1979年,454页。

③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下文引自《全唐诗》者不再注明,括号内数字,斜杠前为《全唐诗》卷数,斜杠后为《全唐诗》页数。

强歌强舞竟难胜，花落花开泪满缯。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

这首小诗写铜雀伎当活的殉葬品比当死的殉葬品还难受，可以说把铜雀伎的奴隶地位写透了。以铜雀伎为题材的诗，作者们大抵都是把自己的泪水同铜雀伎的泪水和在一起写的，因此读起来十分感人。读了这些作品，我们对曹操乃至封建社会制度的认识会更全面、更深入一些。另一首是崔国辅的《魏宫词》(119/1202)：

朝日照红妆，拟上铜雀台。画眉犹未了，魏帝使人催。

这首小诗揭露了魏帝的荒淫生活：太阳刚出山，宫女们还没有打扮好，他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去催了。“魏帝”指魏文帝曹丕，《世说新语·贤媛》云：“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武则天是唐太宗的才人，却成了唐高宗的皇后，就荒淫程度而言，唐代统治者与曹氏父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看起来此诗是在讽刺魏文帝之荒淫，然而唐人常以历史题材反映现实生活，常以往日史实影射当朝事件，所以高步瀛指出：“丕已朽骨，又安足刺？其殆意感武才人之事，不能明言，而姑托于丕乎？”<sup>①</sup>

杜荀鹤的《伤碛石县病叟》(693/7979)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

无子无孙一病翁，将何筋力事耕农。官家不管蓬蒿地，须勒王租出此中。

这首诗的姊妹篇是作者的《山中寡妇》(692/7958)：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

<sup>①</sup>《唐宋诗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761页。

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剥削的残忍性时，诗人不像经济学家那样借助统计数字，而是借用“病叟”、“寡妇”这样的艺术形象，因而也更加感人。《山中寡妇》这类诗歌告诉我们，在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下，妇女们的遭遇是非常辛酸和难堪的。

旧社会好比万丈深的枯井，妇女们生活在井底。她们除了受到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外，还要受到精神奴役和宗法制度的摧残。孟子说：“丈夫生而愿为之以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以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sup>①</sup>对于相互恋爱而结婚的男女来说真正受到歧视损害的当然是女子，白居易的诗《井底引银瓶》(427/4707)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婬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白居易显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上，他写这首诗的目的是：“止淫奔也。”但是我们读了这首诗不能不对诗中所描写的美丽、多

① 《孟子注疏》卷六上《滕文公章句下》，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2711页。

情、纯洁、大胆而又善良的妇女表示同情。恩格斯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sup>①</sup>这首诗中的女主人的婚姻应当说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然而她却受到了鄙视，甚至弄到有家难呆、无路可走的地步。是谁造成了这种悲惨的结局呢？是吃人的封建礼教。

上面这首诗写一位女子结婚未待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所造成的悲剧，但即使通过明媒正娶，妇女们的命运也不见得就好一些。张籍写的《离妇》(383/4297)就是一个例子。请听这位离妇辛酸的叙述和不平的呼声吧：“十载来夫家，闺门无瑕疵。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托身言同穴，今日事乖违。”接着她说姑娘对她的辞别恋恋不舍。最后她发出了“为人莫作女，作女实难为”的悲鸣。这首诗的深刻性在于它把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不归之于丈夫，夫妻间开始倒是很恩爱的，不归之于婆婆，婆媳间的关系也很好，而归之于“古制”。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sup>②</sup>无后甚至于被列为“七出”<sup>③</sup>的首条。诗歌结尾所发出的不平呼声在中国回荡了几千年。

封建宗法制度还有一条规矩叫“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sup>④</sup>。西汉的刘向也说过类似的话：“父在则倚父，夫在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3页。

② 《孟子注疏》卷七下《离娄章句上》赵岐注：“於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义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取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2723页。

③ 《仪礼注疏》卷三〇《丧服》贾公彦疏：“七出者：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104页。

④ 同上，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106页。

则倚夫，子在则倚子。”<sup>①</sup>“倚”与“从”的意思大致相同，由此可见妇女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如果那位妇女连儿子也没有了，那么等待她的只有死路一条，如徐月英的内心独白《叙怀》(802/9033)：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长  
羨荆钗和布裙。

当然徐月英本人并没有去死，而是顽强地活着。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只好当了妓女。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对于这位不幸的妇女，谁又会去责备她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地研究唐诗中的妇女形象，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封建社会的认识。

在艺术上，我们认为描写妇女的唐诗也充分地体现了唐诗的特点。唐诗的艺术特色，最突出的是它的抒情性，《御制全唐诗序》说：“虽穷达殊途，悲愉异境，而以言乎摅写性情，则其致一也。”<sup>②</sup>唐诗抒写性情的特点与宋诗相比，尤为分明，前人早已说过：“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径露。”<sup>③</sup>抒情是诗的本质特征，应当说《诗经》、《楚辞》、汉乐府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优秀诗歌都具有抒情的特点，但是它们同唐诗比起来，不仅数量少，而且卓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也不很多，因此唐诗的抒情特点就格外被人注意、被人称道了。

描写妇女的唐诗集中体现了唐诗的特点，这是由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唐代妇女基本上处于奴隶、半奴隶、玩物、高级玩物的状况，她们的性爱被禁锢、窒息、摧残。为了获得爱情，她们

① 《列女传》卷四《齐杞梁妻》，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9页。

② 《全唐诗》卷首，5页。

③ 《师友传灯续录》第十九则，见《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52页。

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斗争着。她们有爱有恨，有悲有怨，有呼喊，也有呻吟。所有这些思想感情被真实地反映在诗歌中，就不能不使诗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描写妇女的唐诗中所饱含着的感情，往往都是通过丰富的想像和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出来的，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如在唐代，夫妻长期分居是一个极其普遍而又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唐诗中有着广泛而强烈的反映，单是以别离为题的就有《古别离》、《生别离》、《远别离》、《久别离》、《新别离》、《暗别离》、《潜别离》、《别离作》、《别离曲》等。正是现实生活的土壤和大量的诗歌创作实践，使唐诗中产生了许多奇妙的想像和感人的艺术形象。试举一组例子加以说明。和丈夫在一起过安定的生活，这是妇女们正当的权利和要求。为了实现和丈夫永远在一起的理想，她们“愿为波与浪，俱起碧流中”，“愿作杨与柳，同向玉窗垂”<sup>①</sup>。当丈夫第二天要驱车离家时，她们“愿得双车轮，一夜生四角”<sup>②</sup>，使车子无法行动。当丈夫乘车动身时，她们又想到“安得太行山，移来君马前”<sup>③</sup>，希望挡住丈夫的去路。当丈夫的车子离开家以后，她们又“愿为玉盃系华轼，终日有声在君侧”<sup>④</sup>，能够和丈夫一道前进。当丈夫终年在外，迟迟不归的时候，她们下了狠心：“常思劲北风，吹折双车轮。”<sup>⑤</sup>

最后，我想再完整地引用孟郊的《车遥遥》(25/338)来分析一

① 《全唐诗》卷二五一，2836页。

② 《全唐诗》卷六二七，7199页。

③ 《全唐诗》卷六〇四，6996页。

④ 《全唐诗》卷二五，338—339页。

⑤ 《全唐诗》卷五九三，6876页。



下唐诗在这方面所获得的艺术成就：

路喜到江尽，江上又通舟。舟车两无阻，何处不得游。丈夫四方志，女子安可留？郎自别日言：“无令生远愁。”旅雁忽叫月，断猿寒啼秋。此夕梦君梦，君在百城楼。寄泪无因波，寄恨无因舟。愿为取者手，与郎回马头。

这首诗写了离妇希望大江挡住丈夫去路的念头，又写了她不该挽留丈夫的想法；写了离妇对同丈夫离别之日的回忆，又写了她此时此刻地的所见所闻所产生的忧愁；写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又写了她对丈夫的怨恨；最后诗人出人意料地写她想成为一个赶车人，调转丈夫的马头，从而表现了她怀念丈夫的情绪所达到的高潮。全诗只用了九十个字，就把这位离妇矛盾复杂的心情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从而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描写妇女生活的唐诗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通过唐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状况。同样，对唐代各阶层妇女生活状况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唐诗的认识。本书拟采用以诗证史与以史证诗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唐代妇女生活，研究唐诗，研究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的关系。

本书常用唐宋笔记小说为据，唐人刘知几《史通》卷一〇《杂述》云：“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璩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正如陈寅恪所说：“小说亦可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sup>①</sup>有些笔记小说虽然从细节上看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①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见《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67页。